

1949年與台灣的跨文化潛力

何乏筆

—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中國皇朝崩潰與中華民國成立的效應在知識界強烈爆發，使得20世紀漢語思想陷入傳統與現代、民族主義(包含反日情緒)與西化(民主、科學)的爭論中。然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思想上造成激化立場，對立分明，將冷戰的政治分裂意識型態強加在思想身上。冷戰的知識框架在海峽兩岸產生長久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改革開放(1979)，以及台灣的解嚴(1987)似乎使得意識型態的對立開始融冰，儼然因此奠定了療傷和溝通的歷史條件。但事實上，幾十年的交流互動仍無法撫平1949年的創傷。不可諱言，1949對台灣所產生的震撼一直沒有獲得充分的歷史清理，台灣的文化創造力嚴重受損，甚至陷入癱瘓的危機。因為缺乏宏觀而深刻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意識，學術思想也很容易臣服於學術官僚的機制；如此創造力癱瘓的危機，卻被掩蓋於不得不適應全球知識經濟之形式程序的荒謬理由之下。從台灣的「文化」意義反省1949年，即在於試圖從此文化癱瘓中尋求解套的可能。至少楊儒賓先生在〈1949的禮讚〉(《思想》12期)一文中的呼喚可做如是解。

他說：

隨著中國與東方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興起，台灣會在歷史的新巨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這樣的歷史目的論不是妄想，而是台灣人民很謙卑的一種祈求。因為經由血淚證成的創造性轉化，中國與東亞不必然再是台灣外部的打壓力量，它們反而是台灣內部創造力的泉源。我們不因懷舊而回首，我們的回首是為了迎向未來，回顧的雙眼與前瞻的雙眼是同樣的一對眼睛。歷史會證明：1949是個奇妙的數字，台灣人民將它從苦痛的記憶轉化為傲人的記號。

歷史或許可以拿來證明各種事相，只是通常不會證明某些熱誠知識分子對它的期待。或者說，提倡中華文化的學者在解嚴後從未充分反省過，威權政治與文化教育的共謀關係，從未充分思考過為什麼反而造成許多學生對中華文化深表反感，不僅視之為陳腔濫調，甚至記憶中將之等同於規訓與懲罰。在反省歷史的意願與能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將回顧化為創造泉源的條件從何而來？

衆所周知，在1945年後東亞與歐洲的歷史意識大為不同。兩個德國在1949年成立以來，被強烈的歷史意識及歷史責任感所銘刻。無論是西德在二戰後的經濟發展或德國的統一，都以西德參與推動歐盟的興起為先決條件。而且，歐盟的發展最初的形成動機即是慘痛的歷史意識：將來如何能夠避免再發生如同兩次世界大戰之災難。在民族認同之外形成後民族式的歐洲認同，其艱難當然反映在跨國機構之建立，以及歐洲憲法的爭論上，也反映在文化與學術層面上。比如說，直到1990年代法國與德國哲學家的關係顯現嚴重的溝通障礙及難以化解的誤會。這些困難在很高程度上可歸結於不同

的歷史文化經驗：在1929年出生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對法國的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思想家的嚴厲批判，都離不開尼采和海德格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糾結。直到出生於1945年以後，甚至1960年代的批判理論思想家才出現一種透過當代法國思想，重新解讀這些具爭議性思想家的可能。在過去60多年來，歐洲學者致力於徹底探索民族主義與極權專制的根源，藉以思索和解的條件。在二戰後的東亞，面對歷史的努力卻比較薄弱，未曾進入後民族的動態發展。

因為台灣特殊的地理條件，以及20世紀歷史經驗的複雜性，此一島嶼或許在東亞和解的歷程中，尤其在兩岸與日本的關係上，將會扮演或可能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為此，必須思考中國大陸的、日本的和歐美在20世紀的三大影響勢力，如何能理解為既緊張又互補的歷史力量。若無法承認三者既緊張又互補的複雜結構，「新台灣」很可能將停留於妄想。

二

本節從人文科學的，尤其是哲學的角度，粗略思考將外部的打壓力量轉換成內部創造力的觀點。今天，台灣學術工作的衡量標準尤其以英美學術界為主要參照，評鑑時英語的出版比中文著作更受重視。這當然反映全球知識生產中的權力結構，其中台灣不僅很難與西方學術界競爭，似乎也逐漸落後於中國大陸的研究脈動。大陸學者的問題視域益發反映出，中國在全球文化體系中的重要性不斷地增長，此乃迫使大陸學者必須以全球的視野思考當代問題。從大陸學者的研究中，可看出對當代問題的深刻意識與中國傳統資源的探索之串連。因而，長久被打壓或被看成過時的中華文化，反成為被忽視已久的巨擘。

如果當今中國大陸的「國學熱」與民族主義相連接，那麼在台灣，本土意識與民族主義的增強，以及相關的「去中國化」傾向，似乎嚴重阻礙中華文化在台灣成為創造力的內部資源。不過，此解讀或許過於淺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擺脫大中華民族主義，可視為中華文化可能成為創造力資源的重要條件（過去為了對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傳統而宣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仍意圖維護民族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緊密關係，但所造成的反效果歷歷在目）。筆者認為，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去意識型態化與「去民族主義化」，有助於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使中華文化、日本文化與歐美國文化成為台灣文化的共同資源。文化上的去中國化相對化了國民政府因抗戰經驗而帶到台灣的反日立場，凸顯了不同族群的衝突緊張，不同的聲音浮上台面：有人譴責「本省人」美化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有人譴責「外省人」輕視戒嚴（1949-1987）及白色恐怖的慘痛經驗。此情形顯示，以不同歷史經驗為背景的世界觀，仍然處在難以和解的對立之中。從某些面向來看，1949對台灣而言，或許代表著與50年之久的日本殖民時期之斷層。但實際上可以觀察到，在1945年前出生的老台灣人身上，仍有許多對日本文化的記憶續存於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對日本思想史的關注，無論是日本儒學、京都學派、日本學者對東亞現代性的反思，或對曾經以日文書寫的台灣作家的研究都顯示，日本文化在1949年以後仍然是台灣文化的重要資源。台灣的文化意識避開了文化大革命以暴力反傳統，又能透過去中國化，減輕中華文化成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危險，對日治時期的探討也逐漸得出比較符合歷史複雜性的理解。另外，台灣也少見強烈的反西方或反美情緒，而更是以一種開放的學習甚至模仿態度看待西方。

對筆者而言，中國、日本和西方影響之組合的變化狀態，以及

這三種主要文化資源的複雜關係，構成了當代台灣的「主體性」及其內部的創造力資源。此創造力乃依據這三種資源的緊張與互補關係，而若其中的一種侵吞其他兩者，創造力便會受損減弱；此外，毫無互動的共存，或意識型態的分裂和敵意也不利於創造力的開發。楊儒賓先生指出：「在文化意義上，台灣比任何華文地區代表漢文化，因為漢文化在這裡是生活中的有機成分，它仍在欣欣不已的創造。」問題是，此觀點是否已將三個資源的輕重過度地向中國的資源移動。儘管可能有此質疑，筆者仍然認為，台灣文化的跨文化潛力的最佳發展條件乃是去意識型態化的、去國族主義化的「漢文化」（亦即以中國文字為核心的漢字文化）。漢語在學術與文學方面的特殊潛力接著而來。因為現代漢語至少間接地延續著古漢語，並且藉由通過日文或西方語文的翻譯，已形成了跨語言的性質，現代漢語似乎特別適合於讓三種文化資源產生活生生的關係，並使之開顯獨特的文化創造性。

三

走筆至此心裡感到相當不安。以上的論述似乎過於空泛。究竟是誰在說話？從哪一角度說話？因為如此，本文將採取較個人的方式切入相關反思。筆者經常被問到：你為什麼來台灣？或你為何留在台灣？一旦要回答這類的問題就會發現，某些個人因素與某些龐大的、若有似無的文化想像難以區分。筆者於1993年首次來台灣修習中文，這確實和1949年以來所建構的台灣形象息息相關。故宮博物院的吸引力，以及台灣將是學習中華文化最佳選擇的推薦，無疑構成了來台的重要理由（此外，語言教學的品質，以及居住環境的自由選擇，在個人層面上加強了台灣的優勢）；而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條

件和研究自由，又提供了留在台灣的良好機會。在台灣十幾年，筆者經常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有時聽到「你比中國人還中國」，有時亦聽到「你不懂我們的文化」。所以，角度是域外還是域內，或是非域外非域內，亦域內亦域外？一般來說，此一不確定性的問題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不過，在面對某些質疑的時候，不得不作釐清的努力。例如，有人問「你如此投入對中華文化的學習，是否意味德國人因為民族認同的困頓，而缺乏對自己文化的信心？」

據悉目前已有約10位德國朋友在台灣哲學界工作。我們當然也會討論為什麼都是德國人，而不是法國人，或不是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問題的回答，必然涉及20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災難性影響，以及二戰後對民族主義的徹底質疑與深刻反省。這些質疑與反省，不僅促使了二戰後的德國成為推動歐盟的關鍵力量，似乎在思想上也提供了突破歐洲中心主義的有利條件。依此筆者承認，青年德國哲學家到台灣投入當代漢語哲學，確實與德國的特殊歷史經驗及自我懷疑的頓挫有關。但另一方面，筆者亦不認為，學習中華文化便等同於拋棄德國文化或歐洲文化，反而是另有體會：越是能深入中華文化，越是能深化對歐洲文化的認知，並從中發掘新意。在學習的過程中，對中華文化在台灣原始想像逐漸幻滅。同時，歐洲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比較架構崩解了，使得中華文化不再是單純的域外或他者，在此過程中已然從較靜態的對照思維，轉而過渡到跨文化的動態場域。台灣的本土化、去中國化運動質疑了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則挑戰台灣能代表中華文化的信念，另又巧妙地與德國二戰後的歷史頓挫與文化意識，發生深層的呼應。由跨文化共同問題出發，反思中華文化與歐洲文化及其跨文化動態的信心隨之產生。

換言之，跨文化思考突破異己分明、血統純正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讓思想觸及哈伯瑪斯所謂「後民族組構」(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臆想以過去民族主義與國家文化融為一體的思維模式，不可能和平地解決海峽兩岸的問題。因此，中華文化能否展開後民族格局，對當代東亞而言是極為迫切的課題。的確，台灣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同時，又陷入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悲情與挫折。然而，倘若轉換思維，以既非中華民族主義、亦非台灣民族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呢？這樣的可能似乎在艱難的政治與文化情境中萌生，促使我們展開另類思維與嶄新的文化想像。

何乏筆(Fabian Heubel)，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研究領域：跨文化研究、當代歐洲哲學、漢語哲學、美學。著作目錄可參考個人網頁：<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eube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臺北市：聯經，2009年10月（民98年）．
336面．14.8×21公分．（思想：13）
ISBN 978-957-08-3485-7（平裝）

1.臺灣史 2.中華民國史 3.中國大陸研究
4.現代哲學 5.文集

733.29207

98019582